

出版說明

中國讀者對於與我們有著複雜情緣的鄰國日本，一直抱有高度的關注。尤其是進入近代以後，其發展軌跡與中國出現了明顯的差異——經歷了前近代國家向近現代的轉化、發展和崛起，對外的武力擴張並由此導致了戰敗。戰後的日本重新出發，社會政治體制發生了質的改變，在一九七〇年代一躍而成為世界上的第二大經濟體，而在近年又出現了長期的經濟低迷，整個社會在沉悶中孕育著躁動與不安。對於這樣的一段近現代歷程，日本人自己是如何來描述的呢？對於自己的近現代史，他們又是如何來認識的呢？這是廣大中文圈讀者所關切並抱有相當興趣的。出於這樣的目的，我們選擇了日本岩波書店近年（二〇〇六——二〇一〇年）來以「岩波新書」的形式陸續推出的十卷本「日本近現代史」，聘請了一批在此領域上頗有造詣的學者將其譯成中文，推介給各位讀者。

這套叢書的作者，大多是在日本近現代史研究上卓有建樹的學者或教授，他們運用

了既有的研究成果和相對完備的史料，力圖對日本近現代史的各個階段作出接近史實的描繪。這套叢書可謂是日本學者在這一領域內最新的系列性的研究成果，史料豐富，敘述脈絡清晰，問世以後在日本國內廣受好評，一版再版，很多都出到了十版以上。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儘管本叢書的作者都試圖秉持學者的立場，但其對許多歷史場景的理解、尤其是涉及與中國的部分，自然是以日本為本體，與我們的立場必然有差異，我們出版這套叢書，並不意味著我們認同原作者的觀點，而是為我們了解和理解一般日本人對於自己近現代史的認識提供一個較為完整的素材。

這套叢書在翻譯和編輯的過程中，對正文未做任何刪節。原有的插圖和大事年表，一概保留；原文中專門詞語的表述，一般均予以直譯（必要時譯者也會給予適當的解釋）；對原文中出現的重要的人名、事件等，譯者會以腳註的形式進行適當的註釋；對原著中的參考文獻，中文翻譯後再列出原文，以便有需要的讀者可查閱原文文獻；原著中的索引，考慮到對中文讀者的意義不大，略去不用。

目錄

前言	10
----	----

第1章 戰後國際體制的形成與日本的戰敗	21
---------------------	----

一、總力戰體制與戰敗	23
------------	----

二、戰後國際體系的形成	35
-------------	----

三、通往戰敗之路	42
----------	----

第2章 非軍事化與民主化	49
--------------	----

一、佔領體制的形成	51
-----------	----

二、佔領改革的實施	61
-----------	----

三、東京審判與戰爭責任	66
四、民主化政策的各方面	72

第3章 邁向新憲法的形成……………79

一、圍繞憲法的修改	81
二、美國政府與GHQ	90
三、GHQ的憲法草案	97
四、國內的各憲法草案與憲法體制的確立	105

第4章 政黨勢力與大眾運動……………113

一、戰敗與日本的領導人	116
二、戰敗前後的政界重組	126
三、GHQ與開除公職	135
四、自由主義派與協同主義派	138

第5章 中道內閣的展開與自由主義派的集結……………157

一、片山聯合內閣的時代……………159

二、蘆田中道內閣的成立……………166

三、冷戰與佔領政策的轉型……………178

四、道奇路線與社會重組……………186

第6章 戰後體制的形成……………199

一、各種勢力的體制構想……………201

二、一九五〇年代的日本社會……………206

結語……………216

後記……………221

參考文獻……………224

大事年表……………231

前言

重新審視 佔領與改 革的時代

雖已是六十年前的陳年往事，但應該如何評價二戰之後即日本佔領與改革的時期，在今天仍極具現實性。因為我們現在所面臨的各種問題——例如修改憲法問題、從年功序列和長期雇傭制的日本式經營向由正社員與無正式勞動合同的計時工^①構成的二元化勞動制度的轉變、在政治上從一黨獨大體制向聯合政權體制轉變，等等——其前提都是在佔領與改革時期建立起來的，也是我們思考今後轉變的方向時不可或缺的材料。

關於二戰的戰敗、佔領與改革時期，正如約翰·道爾《擁抱戰敗》一書的書名所代表的，可以說不論對佔領與改革本身是持肯定或否定的態度，以往的研究基本上都認為佔領成功獲取了被佔領國、包括其下層民眾的支持。

持肯定態度的人，在基本支持佔領改革的內容與方向的同时指出了其不徹底的部分，認為改革應該更加徹底化。而持否定態度的人，則指出本應是有條件投

① 原文為飛特族／自由職業者。——全書腳註均為譯者註。

降佔領改革，實際卻是在徹底的審查制度和強制之下實現的，只有把這種改革復原才能談及「戰後」的結束。持否定態度的人與肯定態度的人，其認識是有共通之處的，那就是無條件投降帶來的改革是成功的。本書則希望重新思考、審視這種對佔領與改革時期的敘述是否恰當。

各種各樣的戰後觀

對「戰後」的認識，最常談到的說法是「實現了自由、平等與解除貧困」。佔領期駐日盟軍總司令部（GHQ）的民間情報教育局（CIE）在日本全國各地所放映的電影，都是從這種視角出發的。也就是說我們連對貧困的這種定義方式都無條件接受了。

此外，佔領改革還改變了日本的一切。日本戰前、戰時沒有任何值得肯定的東西。日本的戰時體制與同盟國之間沒有任何共通之處。日本的主要政黨、領導人非常因循守舊、完全沒有改革意識，這種看法不論過去與現在都存在。這些觀點難道不是由GHQ有戰略地、或者不自覺地按照自己的標準創造出來的嗎？現在我們需要的正是從史實中找出與上述看法不同的現實，並進行重構性的歷史思考。

日本的戰前、戰時就沒有自由、平等、富足嗎？戰後就沒有不自由、不平等

和貧困嗎？戰前、戰時不是有一種「協同自治」^①的觀點嗎？它既不同於市場全體主義^②，又不同於國家主義。在帝國主義、總動員體制、管理社會等各方面，戰時的日本與同盟國之間不是存在著共同點嗎？以及，關於體制和憲法的構想，佔領期的日本政府和領導人就真的沒有自我變革的能力嗎？

對戰後的這種表述，是通過外部賦予的印象即GHQ等各部分負責人的功績故事形成的，又或是投射了當事人經驗與願望。但是基於體驗、證言、記憶的戰後認識及其方法，之前一直為我們提供了某種確切的觀念。這些認識和方法在今天卻讓人感到是局部的、主觀的、甚至有時是有些恣意的，這又是為甚麼呢？

這不是因為構成認識的體驗、記憶等素材本身不具有客觀性或是局部的，而是

① 基於協同主義的自治。協同主義，即Corporatism，或譯為社團主義、法團主義、合作主義、統合主義等，指源於歐洲政治的一種現象，各行業的行業協會或工會與政府保持密切的合作、協作關係，並通過此方式保證了社會對政治的參與和發言權。其經典定義可參考Philippe C. Schmitter, "Still the Century of Corporatism?",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 36, No. 1, 1974。在日本的發展源流可參見上述這本書的註解11。但需指出的是，一九三〇年代日本語境下的「協同主義」是否等同於源自歐洲的自下而上的社團主義（社會導向的社團主義）還有很大爭議，因其帶有明顯的由上而下（國家導向的社團主義）的特徵，譯者保留了日文協同主義一詞以示區別。

② 指一九九〇年代到現在美國式的新自由主義的擴散、全球化的發展帶來的並不是自由放任型的市場經濟，而是帶有全體主義特徵或更極端的說是以市場經濟為名的全體主義制度。此詞並非學術概念，而是自一九九〇年代中後期日本為擺脫長期經濟衰退進行結構改革逐步實施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的背景下，大眾輿論中為反對、批判新自由主義而創造的組合詞。

由於保證其客觀性的社會整體結構正在發生變化（也就是戰後體制的動搖），這種變化要求與其相應的解讀，但符合社會變化的、對體驗與記憶的敘述卻還並不存在。

從現狀來說我們能看到的就是把無條件投降當作成功故事的這種局部的、主觀的、恣意的敘述。例如 Carol N. Gluck 對「漫長的戰後」的說明，就是從日本獨特的認知狀況來解釋的，即別的國家已經進入了現代或近代後期的歷史時期，在日本則不過處於近代的出發點。（《思考歷史》）

但戰後國際體系層面上最強有力的力量一直是戰勝國體系。忽視了這一點，那對戰後的看法必然是局部的、恣意的。為了更加通俗易懂地敘述戰後，必須要有體系性、整體性的觀點。也就是說，要將戰後放在國際關係、政治、經濟、法律、社會、地區等包含了這個體制所有領域的系統及其相互作用中去看，去敘述。只有這樣才能構成基於學術的新的表達。

對戰後體制的超越及敘述

戰後體制，在國際上是由波茨坦（即戰勝國）體系、舊金山（即冷戰）體系，政治上由五五年體制，經濟上由以民用需要為中心的本式經營體制，法律上由日本憲法體制等構成的（參見下頁表格）。

而我們現在所處的正是這個體制動搖、並即將向下一個體制轉型的

表 近現代日本的體系變化

成立時期	1880 年前後	1890 年前後	1920 年代	1940 年代 前半期	1950 年代	現在
體制 附屬 體系			自由主義體制	戰時體制 翼贊體制	戰後體制	脫離戰後體制
國際	帝國主義	日英同盟 (英國霸權 下的和平)	凡爾賽—華盛頓 體系	「世界新秩序」 「東亞新秩序」	波茨坦—舊金山 體系	一元化「帝國」 的發展 多元化的亞洲的 安全共同體(後 殖民主義)
政治	藩閥集權	藩閥 + 政黨	政黨政治 + 普選	「政治新體制」	五年體制	聯合政權體制
經濟	國家主導	國家主導	自由主義	「經濟新體制」 從所有制到經 營制	民需為中心的 「日本式經營」	從新自由主義的 經營制到所有制 經濟
法律	明治憲法	明治憲法	治安維持法	國家總動員法	日本國憲法	日本國憲法 修正
社會	近代與 前近代	貧富差距理所當然 的體制		均等化與平等化	企業中心的社會 從機能到符號	個性化・多樣化 脫離消費社會 非政府・非營利 領域的擴大
地方	地方分權	中央集權	地方分權	中央集權	中央集權	地方分權
課題	國家獨立 殖產興業	維持帝國 應對國際化的經濟 擴大政治基礎 社會政策	對亞洲的排他性 統治 重化學工業化 均等化・平等化	應對冷戰 重化學工業化 平等化縮小中央 與地方、階層之 間的差距	市場化 「普通國家」化 「帝國化」	國際化 老齡化 多樣化 個性化 共生 危機共擔

出處：根據雨宮昭一《戰時戰後體制論》、《近代日本的戰爭指導》、《總力戰體制與地區自治》、《戰後日本的形成・變化與戰爭》(戰時時代史學學會編《戰爭與和平的同時代史》)、《沒有同化式佔領也可能進行民主化》(戰時時代史學學會編《佔領與民主主義的同時代史》)整理。

時期。下一個體制並不是自然發生的，而是各種選擇相互對抗和整合之後成型的，其成型需要系統化、整體性、長期性的政治活動。

如果我們假設在甚麼都不做、任由其發展的情況下將會過渡到 part1 的體制，而另一種可能、即有可能選擇的體制是 part2，那麼 part1 的體制就是在國際上以美國為中心的帝國得以發展，經濟上新自由主義，法律上修改憲法，社會上市場全體主義。part2 的體制則是，在國際上對近代國家主權相互限制，亞洲安全共同體，經濟上形成非營利非政府的協同主義經濟與市場經濟的混合經濟制，社會上非政府非營利領域的社會性聯合得以擴展等。

當我們考慮即將到來的體制時，不僅要考慮上述內容，轉型過程同樣重要。

目前為止，不論是從一九二〇年代的自由主義體制過渡到一九四〇年代的翼贊體制^①、總力戰體制，還是一九五〇年代從總力戰體制到戰後體制的轉型，都是以戰爭這種軍事形態來實現的。因此現有體制在未來轉型、過渡時是採取軍事的還是和平的形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在此筆者還要強調的是，轉型的形態與

① 翼贊的本意是輔佐天皇，一九四〇年成立的大政翼贊會為翼贊體制的核心組織，此體制下政府奉行「一國一政黨（或組織）」的方針，是與納粹德國等相仿的獨裁專政體制。其體制是由近衛內閣提出的，因此又稱「近衛新體制」。

對它的敘述有著很深的關係。比如，蘇聯解體之後整個世界轉型為帝國美國的一元化發展，正如約翰·道爾的《擁抱戰敗》所代表的，「無條件投降帶來成功故事」的敘述達到了其巔峰，創造了在戰勝方、戰敗方之間，甚至連戰敗方統治階層，戰敗方的被統治階層、下層民眾們都與戰勝方徹底擁抱的歷史。（例如增補版：下，第100頁）

為了帝國在後冷戰時期的發展，美國在世界各地鎮壓內戰與抵抗，而道爾的敘述可以說正是為其服務的理想形態，也是我們正在向 Part I 那樣的體制進行軍事轉型的極好的證明。

無條件投降模式

筆者將以下內容稱為無條件投降模式：首先在開戰過程中要求敵方放棄所有的或者基本的獨立性、並威脅如不同意則只有開戰；在戰鬥過程中採取破壞性的無差別轟炸、投放原子彈等徹底殲滅措施；在戰爭結束過程中不進行和談，而是要求徹底投降；在佔領過程中全面改造被佔領方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

從無條件投降模式來看，有人覺得因為從結果來看被佔領具有使日本獲得民主主義等正面價值的效果，所以是無所謂的，但筆者並不這麼看。原因是主體之

間具有獨立性的關係是民主主義的前提條件，不論是國家大小或強弱。否定了這種獨立性，以民主為前提的政治則不可能成立。沒有讓日本真正為戰爭的結果引咎負責，包括並沒有讓天皇退位等，也是對主體獨立性的一種否定。

徹底消除主體間關係的無條件投降模式所帶來的成功故事，按照現在普及的國際性市民的觀念來看，雖然總是讓人感到不快、不舒服，但在美國的歷史中卻是一直存在並且被不斷再生產的：與原住民的內戰、南北戰爭都是這樣，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漫長的戰後並沒有結束。

成功故事 之外的敘 述可能嗎

不同於無條件投降模式帶來成功故事的敘述可能嗎？為了摸索這種敘述方式，我們可以思考以下問題：

如前所述，關於戰後的敘述是局部的、主觀的、恣意的，另一方面這種成功故事般的敘述又成了一種無知之幕，使我們看不到幕後的因素。這種敘述方式是我們正在向 part 1 體制進行軍事轉型的表現。那麼可以說，我們現在需要與之不同的敘述方式，需要「學術」即「系統化的知識與方法」（《廣辭苑》），需要「科學」也即「將人類經驗進行公共的、客觀的整理與傳遞的行為」（《平凡社 大百科事典》）。這並不意味著可以完全拋開、不考慮政治。相反還

需要系統化、整體性、長期性的政治。也就是說，後戰後體制的內容和為實現它的戰略會由於這種努力而浮現出來。正如同過去「資本主義大辯論」^①的實質是戰略性爭論一樣，因為對資本主義的看法，關乎能否將明治維新稱為內戰的「學術」評價。

要想實現具備上述意義與歷史地位的學術式敘述，需要以下視點：使成功故事式的敘述相對化，一個是要考察所謂由於佔領而被「改革」的要素，它們的契機在戰前、戰時、臨近戰敗之時是否已經存在。如果已經存在，那就有必要將其與總力戰體制下戰敗後的變革與佔領所帶來的變革明確區分開來。通過這樣的考察，就可以來討論在沒有佔領的前提下民主化是否有可能。

最近二十年間總力戰體制論^②造就了日本近現代史研究中的範式轉變，而上

① 指一九二〇至一九三〇年代馬克主義經濟學者中對資本主義在日本的發展過程的爭論。主要分為勞農派和論座派，其中論座派的理論是日本共產黨的建黨基礎，認為日本是天皇領導下的絕對主義制，首先需要進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然後才能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因此又稱革命的兩階段論。而勞農派則認為明治維新已經相當於民主主義革命，堅持可以一舉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一段論。

② 本書所討論的「總力戰體制論」雖然在一九八〇年代就已經出現，但當時美國、英國都已開始新自由主義改革，中曾根政府下日本也開始推行小政府、削減政府開支，對「總力戰體制」的回顧也和當時對戰後政治經濟制度的反思密切相關。其論點基本上可以概括為肯定總力戰體制下的社會民主主義改革，強調戰後體制對其的繼承，其論者在政治立場上是反對新自由主義的。

述的研究方法，又會為總力戰體制帶來新的意義、歷史地位和進展。總力戰體制論，作為規定戰後社會的理論，指出了戰爭時期而不是佔領政策的重要性，戰時開始的結構上的連續性，改變了社會科學、歷史學的研究方向，其歷史地位是為敘述後戰後體制進行了理論準備。如果再加上無條件投降模式的觀點，那麼甚至可能為我們思考如下問題提供材料：即如何重建「消失」了的日美關係、創建亞洲的共同性、使被新自由主義解體的社會民主主義與社會聯合獲得重生。

本書的 結構

本書對戰後十年的敘述，將通過各章對戰敗與佔領分別帶來的改革的區別——沒有佔領也會進行的改革、佔領所帶來的改革、既沒有佔領又沒有戰敗的前提下也會進行的改革——進行思考來實現。

第一章討論佔領改革在政治上、社會上的前提條件：政治上四個政治潮流中的反東條聯合取得了勝利，社會上總力戰體制帶來了社會變化，這些都是戰後的出發點。

第二章論證非軍事化、民主化是否都是由佔領強權帶來的。

第三章涉及日本國憲法的成立過程和內容，思考它是由何種因素決定的、憲法體制是何時形成的。

第四章介紹及論述以往很少被提及的、日本的政治、社會領導人在佔領之前對「改革」的設想，如何進行合縱連橫的史實情態。

第五章論及片山哲、蘆田均兩任內閣的政策，關於這兩任內閣，以往的分析多以其與GHQ民政局的關係為主，這裡討論的是從協同主義與自由主義相互對抗的構圖中，來認識這兩任內閣所具有的歷史意義和地位。

最後第六章討論的是，包括講和方式在內，統合了波茨坦體制、舊金山體制、日本國憲法體制、五五年體制、日本式經營體制的戰後體制到底是甚麼，它又封印了哪些問題。通過這樣的論述，本書想要為敘述戰後提供一種線索，使其成為既非成功故事式的，又非對被封印的各種問題採取迴避態度的自我陶醉式的敘述。（雨宮昭一《表述戰後——從成功故事與自我陶醉到「學問」》）

第1章

戰後國際體制的形成與日本的戰敗



收聽玉音放送的人們(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東京・四谷，每日新聞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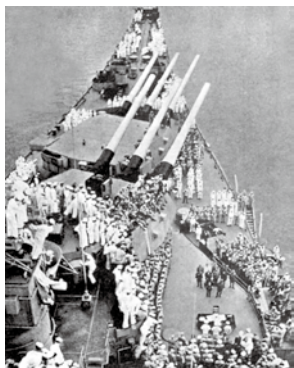


圖 1-1 投降書簽字儀式。水兵們為一睹歷史性的瞬間而擠身探頭。（《綜合日本史》八）

在總力戰體制之前的一九二〇年代，日本社會是甚麼樣子呢？這是一個明顯存在著貧富差距與不平等的社會，因為在農村是地主——佃農之間嚴苛的關係，在城市是工人的無權利狀態，舊家族制度下女性處於受壓迫的地位，城市與農村生活水平大不相同等等。讓我們與德國做一個比較：

佔領改革的 前提條件

一九四五年（昭和二十年）八月十四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八月十五日，日本國民通過「玉音放送」得知了日本戰敗的消息。之後九月二日日本與同盟國在美國軍艦密蘇里號上正式簽署了投降書（全權代表重光葵外相、梅津美治郎參謀總長），成為了戰敗國。

（圖 1-1）正如「前言」中所提到的，我們將從佔領與改革的前提，即戰前、戰時的總力戰體制時代開始，來探討當時的情況。

一、總力戰體制與戰敗

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之後，雖然沒有被佔領，但在政治、經濟、軍事上都實現了民主化與現代化。而日本在一戰時，總力戰體制還非常微弱，且由於是戰勝國，並沒有經歷德國那樣徹底變革的考驗。

不過農村與城市之間、性別之間等各種各樣的差距和不平等，都被保留到了一九三〇年代以後。特別是在始於一九二九年的世界經濟危機之中，這種差距與不平等凸出成為必需解決的緊要問題。其解決有三個方法：第一是通過社會運動解決，第二是通過實現統治階層中的進步勢力與社會中間階層及其以下階層的聯合解決，第三就是通過參與總力戰體制，實現平等化與現代化進而解決問題。

第一種方法，由於當時治安維持法等對社會運動的鎮壓，政治參與非常有限，因此不具備實現可能性。

至於第二種方法，實現統治階層中進步勢力與社會中間階層以下的聯合，在西班牙取得了成功。這是國外反殖民地運動與國內軍部、進步派的同盟促成民主化帶來的。在日本，雖然曾經存在民政黨與無產階級政黨聯合的可能性，但日中戰爭^①的爆發使這條道路走不通了。（雨宮昭一《戰時戰後體制論》第一章）

① 日中戰爭指七七蘆溝橋事變之後的日本全面侵華戰爭。

可是，社會中的貧富差距與不平等依舊存在，甚至到一九三〇年代後期愈演愈烈。由於第一種、第二種道路都行不通，因此只能靠第三種方法，大部分人參與到總力戰體制，通過平等化、近現代化來解決問題。

從結論上來說，日本是通過國家總動員體制（即總力戰體制）來實現的社會變革。一九三〇年代後期到一九四〇年代前期的總力戰體制，推動了社會關係的平等化、近代化與現代化。關於這個情況，正如丸山真男所分析的，日本從上到下的法西斯主義的背景，是由於日本資本主義結構中真正的無產階級過少且工業化程度太低。（《現代政治的思想與行動》）而事實上，也正是日本的總力戰體制，造就了廣大的無產階級，實現了社會關係的平等化和近、現代化。

支撐總力 戰體制的 四個政治 潮流

下面我們來看一看這個總動員體制是由甚麼樣的旗手推動的。

既然我們需要從主體的角度來思考，那麼就應該考察在戰敗之前就已經開始的社會變革，其在佔領期由甚麼人、怎樣繼承並推動著的。而且我們也需要弄清楚，是何種政治潮流在引導國家總動員體制，而不是把它的建立、社會關係的近現代化看作是戰爭中一個單純、

① 海軍中的派系，因支持日本簽署倫敦海軍條約（一九三〇年）而得名，其對立派系被稱為艦隊派，代表人物為財部彪、谷口尚真，也包括米內光政等人，但條約簽署後的幾年間大部分被相繼編入預備役，實際上在海軍內失勢。不過其定義並不明確，也有人認為條約派包括反對軸心國同盟或對美開戰。

② 陸軍中的派系，力圖實現國家革新，建立高度國防國家。其成員以陸軍大學校畢業生為主，因其注重軍內紀律與控制而得名。

表 1-1 四個政治潮流

政治潮流	政策	主要人物
國防國家派	強制實施從上到下的軍需工業化 國民負擔平等化	東條英機，岸信介，賀屋興宣，和田博雄等（陸軍統制派，革新官僚）
社會國民黨義派	從下到上的社會平等化、近代化、現代化 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 改善勞動條件 國民生活水準平等化 提高女性的社會、政治地位 協同主義 東亞共同體	風見章，麻生久，有馬賴寧，龜井賢一郎，千石興太郎等（昭和研究会，近衛文麿周邊人物）
自由主義派	徹底的產業合理化 精簡財政、裁軍 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 親英美路線	濱口雄幸，鳩山一郎，吉田茂等（與一九二〇年代的政界財界主流一脈相通，及海軍條約派 ^① ）
反動派	恢復明治時代的政治、經濟、社會體制	真崎甚三郎，末次信正，三井甲之等（觀念右翼，地主，陸軍皇道派，海軍艦隊派）

被動的過程。

這種政治潮流共有四個，他們持續存在於戰爭時期、總力戰體制時期，以及佔領以後的時代。

首先我們來概觀一下這四個政治潮流（表 1-1）。

第一個潮流是以東條英機等陸軍統制派^②、岸信介、賀屋興

宣等商工省官員^①為中心的革新官僚^②、新興財閥為主的一批人。他們想要建立從上到下的國防國家、從上到下地強制實現軍需工業化。將日本軍需工業化意味著也必須將社會關係進行平均化與同一化。通過這種努力，之前的那些前近代的或者說是多樣的差距，都在某種程度上被強制地平等化、平均化、同一化了，同時這樣的工業化也迫使社會福利、勞動福利問題得到了一定的改善。比如戰後擔任社會黨政策審議會會長的和田博雄^③，在這個時候還是企劃院官員^④，也屬於國防

① 商工省成立於一九二五年（大正十四年），目的是為了促進、鼓勵國家商、工業的發展，在戰時體制下為了強化軍需產業而被改造為軍需省，二戰後恢復為商工省，並於一九四九年整改為通商產業省（MITI），二〇〇〇年改為現在的經濟產業省（METI）。戰後的 MITI 起草實施的一系列產業政策一度被認為是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原因。

② 又稱革新官僚，用於區別一九二〇年代被稱為新官僚的右翼官員，其代表性人物是商工次官岸信介，企劃院總裁星野直樹等人，在一戰與經濟危機和戰局刺激之下，為統制經濟（controlled economy）的形成和國家管控進行了政策立案。由於革新官僚為日本導入了五年計劃經濟等立案方式等，被認為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財界等自由主義派因而攻擊其為共產主義分子。

③ 企劃院一九四〇年十月起草的《經濟新體制確立要綱》雖被內閣批准，但由於否定企業對利潤的追求，提倡資本與生產的分離，被財界視為赤化思想的產物。和田博雄作為起草人之一，於一九四一年被以違反治安維持法的名義檢舉、逮捕（又稱企劃院事件）。

④ 前身是一九三五年成立的內閣調查局，一九三七年改組為企劃廳，同年與內閣資源局改組為企劃院，一九四三年被合併到軍需省。主要負責對內閣重要政策及物資動員的起草、立案，在戰時制定統制經濟的各項政策而成為行政系統中凌駕於其他各部門的機關，是所謂革新官僚的大本營。



圖 1-2 和田博雄（一九〇三—一九六七），戰前的企劃院官員，戰後成為社會黨政策審議會會長，力圖推動地主一個農制度的改革。

國家派（圖 1-2），他們這些人在戰後成為了不帶有軍事因素的國防國家派。

第二個是被稱為社會國民主義派的潮流，主要是第一次近衛文麿內閣成立時（一九三七年六月）聚集在近衛周邊

的智囊人物、多為昭和研究会^①相關的人。包括風見章、有馬賴寧等以農村產業組合運動^②為基礎的政治人物，麻生久、龜井貫一郎等工人運動與農民運動的領導人，千石與太郎等在一九二〇年代制定了勞工會法、小作^③權法的官員。他

① 由近衛的盟友後藤隆之助策劃，以蠟山正道為中心的研究團體，成立於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於一九四〇年十一月解散。包括賀屋興宣、風見章、尾崎秀實、三木清等新官僚、知識分子、記者，從事國家政策研究等，實則為近衛的智囊，在第一次近衛內閣時期，發表了東亞協同論，與近衛提出「東亞新秩序聲明」相呼應，影響很大。一九四〇年發表了建立新型國民組織的計劃（近衛新體制，新體制運動），其各項主張的理論基礎就是協同主義。根據三木清的解釋，協同主義是對自由主義和法西斯的揚棄，可以用來對抗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

② 指二戰之前全國範圍內的農村青年自發結成或加入產業合作組織的社會運動。是在產業組合中央會的會頭千石與太郎領導下，由一九三二年開始的產業組合擴充運動發展而來的。千石的理念是發展各行各業的合作組織「合作社，使之替代生產者與需求者之間的中間商，創造一個「既非資本主義又非社會主義的理想型經濟社會」，與歐洲的社團主義非常類似。昭和恐慌之後的日本社會中充斥反資本主義的情緒，同時社會主義運動又在農村受到了嚴厲鎮壓，因此千石的主張在當時極受歡迎。

③ 即佃農。

們與第一個潮流不同，認為應該以從下到上的、包括進行社會運動的方式實現社會的平均化、近現代化，並最終以對外主張東亞共同體、對內主張社會國民黨主義的形式集結在一起。

他們要求的是工人、農民、中小企業經營者、女性等的平等化、要求參加現實政治和經濟過程。因此雖然追求的方向與國防國家派相同，都是社會的平均化、同一化、平等化、現代化，但國防國家派整體上是包括軍需官員在內的官僚組織為中心的派別，而社會國民黨派則是持有社會運動想法的人物居多。

第三個潮流是自由主義派，主要是一九二〇年代的財界主流人士和以其為基礎的既存政黨勢力、官員的主流。代表性人物比如一九二〇年代的田中義一、若槻禮次郎、濱口雄幸等，一九四〇年代的鳩山一郎、吉田茂等。自由主義派由於在一九三〇年、即經濟危機前夜的濱口——若槻內閣時期，採取了徹底的產業合理化、裁軍、精簡財政等過激的自由主義政策，受到了軍部與大眾的強烈抵制。他們認為日本經濟應該從國家保護的階段過渡為民間企業的自主經營（自由主義經濟）。針對一九四〇年代的總力戰體制，他們主張反（或非）總力戰體制。這是由於總力戰體制否定利潤為本的原則，重視經營權而非所有權，要求對現實中的自由主義體系進行相當程度的限制和制約。因此自由主義派對總力戰體制是比較消極的。

最後，第四個潮流是反動派，他們包括真崎甚三郎等陸軍皇道派^①、末次信正等海軍艦隊派^②、三井甲之等觀念右翼以及大多數的地主。開始於大正民主期的工人運動、農民運動或裁軍運動，剝奪了他們很多的既得權益，而總力戰體制又進一步剝奪了他們的權益，因此他們對於總力戰體制是非常反對的。

以上就是 一九二〇至一九三〇年代舉國一致體制下所並存的四個政治潮流。

東條內閣的成立

正如「總力」二字所代表的，對二戰的參與，要求政府強行改革一切有可能阻礙集結其總力的法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因素，結果在形式上使既有的制度解體，使權力集中於內閣。這個總力戰體制，其形成的頂點就是在與英美開戰前夕成立的東條英機內閣（一九四一年十月十八日）（圖 1-3）。

但在其後總力戰體制的發展過程中，上述四個潮流仍然佔據了重要地位。如

① 陸軍內的派系，受北一輝等的精神影響，在國內主張天皇親政並進行國家改造（昭和維新），在外交上主張遠東制蘇聯。在大饗毅內閣時曾一度掌權，後來被東條英機等帶領的陸軍統制派所壓制和取代。

② 這裡指的是 一九三〇年代海軍內的反條約派，代表人物包括東鄉平八郎等。條約派與艦隊派的對立後發展為圍繞內閣干涉天皇統帥權的對立。



圖 1-3 東條英機（一八八四—一九四八），決定發動亞洲·太平洋戰爭的首相，國防國家派的中心人物。

前所述，由於總力戰體制必須要剝奪一部分既得權益、實現重組，那麼掌握既得權益的潮流與沒有既得權益、試圖建立新體系的潮流之間就必定會出現對抗。

這種對抗，在一九四二年六月中途島海戰失敗之後愈加表面化。即，要進一步推動總力戰體制的社會國民黨派和國防國家派聯合與反對總力戰體制的反動派和自由主義派之間的對抗。社會國民黨派與國防國家派的聯合作為主流，與反動派、自由主義派之間的尖銳對立，從日中戰爭後期長期存在直到二戰初期。

反東條聯合的崛起

社會國民黨派與國防國家派聯合雖然在東條內閣成立時達到了頂點，但由於國內進一步總力戰化、國外開始軍事失敗，東條內閣後期，否定總力戰體制的反動派、自由主義派聯合開始崛起了。

一九四五年二月《近衛上奏文》（表1-2）就是反東條聯合的政治宣言。

近衛主張的內容，其綱要可總結為，現在的執政集團侵害了私有財產、家族制度、增強了工人的發言權。侵害私有財產，指的是總力戰體制下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

表 1-2 近衛上奏文^①（一九四五年二月十四日）

昭和二十年二月十四日
上 奏 文
臣遺憾上陳，敗局將遲早必至。以下申述皆以此為前提。
敗局雖將有辱國體，但英美今日之輿論還未涉及國體之變革（然則有種種極端之議論，亦難預測將來之變化），故臣以為若僅敗局一項，國體尚且無憂。護持國體臉面之憂，不若敗局引發共產革命之憂更甚。臣奏今我國內外有向共產革命急劇發展之情勢，即蘇聯在國外之進出異常。蘇聯之意圖我國民並不能確切把握，蓋因一九三五年以來蘇聯採取人民戰線戰術，即兩階段革命之戰術，特共產國際於近日解散以來，我國輕視赤化危險之傾向頗為顯著，此實乃表象，切不可安易視之。蘇聯終難捨其赤化世界之政策，觀其對歐洲諸國最近之露骨策動即可明了此種野心。
蘇聯宏圖在其歐洲之周邊鄰國樹立蘇維埃抑或至少親蘇容共之政權，其策動可謂徐徐前進，觀現狀已大有成功之勢。（中間略）
照如此形勢推斷，蘇聯干涉日本內政之危險終將化為現實（即承認共產黨，要求共產主義者入閣，廢除治安維持法及防共條約等等，一如其對戴高樂政府，巴多格里奧政府之要求）。反觀國內，達成共產革命之條件大有與日俱備之勢。蓋因生活之匱乏，勞動者發言權之增大，對英美之敵愾心之昂揚致使親蘇情緒高漲，軍中所謂革新運動，新官僚運動，其背後皆有左翼分子之暗躍操縱。其中尤應憂慮者為軍中所謂革新運動之流。
正如少壯軍人之多數堅信我國國體與共產主義可以並存，軍中革新論者之基調亦為此信念。仄聞皇族中人亦有同情此類主張者。蓋大部分職業軍人乃中流以下家庭之出身，其境遇多為易於接受共產主義主張者，又於軍中教育徹底灌輸國體之觀念，由是共產分子以國體與共產主義共存論滲透軍隊。（中間略）
自戰局告急以來，叫囂一億玉碎之聲勢愈加浩大。其主張為所謂右翼之流於背後不斷煽動，以此使國內陷入混亂達成其革命之目的，臣睨視其實為共產分子也。（中間略）
臣以為，軍中之流自滿州事變以來致使時局陷入今日之境地，實為終戰之最大障礙。彼等已然失去繼續戰爭之信心，謂可以抵抗者不過為存其顏目而云。
若不能清除軍中之流盡早終戰，則恐彼時民間之右翼、左翼與其響應，引起國內之大混亂以達成其所期之目的。因此若要結束戰局其關鍵前提為先將此等分子一網打盡。
若此等分子得以清除，便乘於上之官僚及民間右翼、左翼分子皆將隱聲蔽影。蓋因彼等尚未結成壯大之勢，不外利用軍部以達成其野心者，故臣以為斷其根本則其枝葉自枯。

（載《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件》）

① 雖然一九四〇年近衛內閣時期的「近衛新體制」，可以說已經是全面的總力戰體制，但近衛在上奏文中稱自己雖兩度組閣但未能看清革新論者背後的意圖，建立了接受其主張的舉國體制，為此深感歉疚與責任。這一段在本書中被略去了。

離，經濟從以利潤為本轉化為以公益為本，將非軍事產業強制轉化為軍事產業或停業等的強制轉停業行為。即通過反對侵害私有財產，來揭露總力戰體制的根本問題。

總力戰體制下，不得不提高實際生產出財富的工人的相對地位。因此，為了對抗之前因地主、資本家們意志所定的體制，制定了工人福利、保健制度，大幅度削減了地主分成的糧食管理制度等，提高了工人、農民的經濟、社會地位。這就是近衛上奏文所說的「勞動者發言權的增加」。

另外，對家族制度的侵害，指的是總力戰、總動員體制下女性勞動力走進社會、提高了女性的社會地位。

反東條聯合的勝利 ——戰後的出發點

在肯定還是否定總力戰體制的激烈爭論中，一九四四年七月十八日的東條內閣總辭職成了象徵最終勝負的事件。也就是說此時自由主義派、反動派為主的反東條聯合取得了勝利。

從這個時候開始，對外政策上的反東條聯合色彩也越來越強。當時的對外政策有三種潮流：早期和平路線、一擊和平路線^①、徹底抵抗

① 為爭取有利的講和條件，先取得一次較大的軍事勝利，這也是日本發起沖繩作戰的主要動因。

路線。贊同近衛上奏文主張的重臣、政治家、軍人等的反東條聯合，從一擊和平轉變為支持早期和平路線。而由於東條內閣中國防國家派的一部分人與反東條聯合合流，社會民主主義派也與國防國家派相背離，最終造成了國防國家派中陸軍主流派孤注一擲的形勢。

這一連串的變化有甚麼意義呢？

關於戰敗，有人說「來得太晚致使太多人犧牲」，「應該能更早實現」，但事實上，只有持早期和平路線的反東條聯合取得勝利之後，才有了可能選擇戰敗的條件。正是在戰敗前夕，自由主義派與反動派聯合、特別是自由主義派逐漸成為了政治主流。

因此在思考佔領與改革的問題時，我們應當注意到，實際上戰敗或佔領的前提是，自由主義派為中心的政治潮流在這之前就已經存在且成為了主流派，以及總力戰體制也已經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社會。

以前我們總認為佔領和改革是與總力戰體制相互對立的，但其實前者對後者也有繼承、完善的一面。從這個意義上來看，並不能說佔領與改革是戰後的起點。吉田茂、鳩山一郎等自由主義派不正是在戰敗之後也繼續著對戰後改革的抵抗嗎？戰後的出發點正是反東條聯合的成功和已被總力戰體制所改造的社會，這

也是一直持續到現在的、戰後日本式「社會民主主義體制」的出發點。（雨宮《岸信介與日本的福利體制》）

二、戰後國際體系的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國際體制

戰爭自然會決出勝負。而戰爭的規模越大，戰爭結束之後的體制就越會反映出勝負的程度和結果。戰勝方與戰敗方的關係也將明確地表現在討論戰勝方之間如何分享勝利果實與維持體系的會議中，表現在與戰敗者講和的會議中。這種關係就是戰後的國際體制，因此國際體制一般會因其會議場所來命名。

一戰的結果是一九一八年（大正七年）的凡爾賽條約——凡爾賽體系，在東亞則是一九二一年十二月，日英美法之間簽署的四國條約（華盛頓條約——華盛頓體系）。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大體上就是一戰之後的戰後國際體系，當然也就是由戰勝國所主導的秩序。而對於這個秩序心存不滿的勢力，為了建立世界新秩序或東亞新秩序而付諸行動，形成了反凡爾賽、反華盛頓的體系，這，就是二戰爆發的原因。

對日本來說一戰之後如何與美、英協調一致是最大的課題。在此前提之下，中國的從屬關係是另一個條件。華盛頓體系可以說一定程度上把對英美的協調與中國的從屬關係統合起來了，但到了大正末期，其統合的前提卻不復存在了。因為華盛頓體系「凍結」了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那樣的中國的民族主義運動，但被「凍結」的民族主義運動開始與日本的滿蒙權益針鋒相對了，而日美之間對於運動的態度也開始對立。

而且蘇聯——雖然沒有受到華盛頓體系承認，但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之後，經歷了十年的苦心經營——又作為東北亞國際舞台上一個無法忽視的角色重新登場了。這些變化又碰巧遇上了一九二九年的世界經濟危機^①，打破了經濟上的相對穩定。

前文所述日本國內各政治潮流所處的政治狀況與一戰之後的國際體系在世界和東亞地區範圍內的這種崩潰有很強的關聯性。（雨宮《近代日本的戰爭指導》）

為抵制一戰之後的戰後國際體系而參與政治的新勢力和力圖保護既得權益的舊勢力的激烈對抗之中，二戰爆發了。下一個戰後國際體系的準備工作隨著軍事

① 即 the Great Depression，大蕭條，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之間源於美國金融危機並波及世界的經濟危機，並成為二戰爆發的一個重要原因。

上逐漸決出勝負也開始同步進行。而這也正是二戰戰後國際體系的形成過程。

波茨坦 公告與 聯合國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登陸馬來半島、攻擊珍珠港，正式對英美開戰。但就在兩天之前，在莫斯科的德軍已經開始潰退，一九四三年九月，意大利新政府宣佈無條件投降，一九四五年五月德國政府無條件投降，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軍隊無條件投降，軸心國接連宣佈了無條件投降。讓我們來回顧一下，作為戰勝方的同盟國在這段時間裡是如何對軸心國軍事失敗後的國際體系進行設計和塑造的。

首先第一步是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四日簽署的大西洋憲章（表1-3），闡述了英美兩國不擴大領土、保持選擇政治形態的自由、公海上的自由、放棄行使武力、解除侵略國武裝等多項原則，從已獲得的既得權益的角度出發闡明了戰爭目的。同時，一旦獲勝就會將與凡爾賽、華盛頓體系一脈相承的戰後國際體系強加給戰敗國，這是與戰爭目的相輔相成的。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召開了決定德國、意大利、日本無條件投降的卡薩布蘭卡會議。同年十一月，富蘭克林·羅斯福、邱吉爾、蔣介石三人舉行開羅會議，確認了卡薩布蘭卡會議的方針，即將徹底戰鬥到日本無條件投降為止，把滿

表 1-3 大西洋憲章^①（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四日）

（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四日簽署於大西洋之上）

美利堅合眾國總統羅斯福和聯合王國國王陛下政府代表首相邱吉爾經過會晤，認為他們兩國國策中某些共同原則應該予以宣佈。他們對於世界所抱有的一個美好未來局面的希望是以此項政策為根據。

（一）兩國並不追求領土或其他方面的擴張。

（二）凡未經有關民族自由意志所同意的領土改變，兩國不願其實現。

（三）尊重各民族自由選擇其賴以生存的政府形式的權利。各民族中的主權和自治權有橫遭剝奪者，兩國俱設法予以恢復。

（四）兩國在尊重他們的現有義務的同時，力使一切國家，不論大小、勝敗，對於為了它們的經濟繁榮所必須的世界貿易及原料的取得俱享受平等待遇。

（五）兩國願意促成一切國家在經濟方面最全面的合作，以便向大家保證改進勞動標準、經濟進步與社會安全。

（六）待納粹暴政被最後毀滅後，兩國希望可以重建和平，使各國俱能在其疆土以內安居樂業，並使全世界所有人類悉有自由生活，無所恐懼，亦不虞匱乏的保證。

（七）這樣一個自由，應使一切人類可以橫渡公海大洋，不受阻礙。

（八）兩國相信世界所有各國，無論為實際上或精神上的原因，必須放棄使用武力。倘國際間仍有國家繼續使用陸海空軍軍備，致在邊境以外實施侵略威脅，或有此可能，則未來和平勢難保持。兩國相信，在廣泛而永久的普遍安全制度未建立之前，此等國家軍備的解除，實屬必要。同時，兩國當贊助與鼓勵其他一切實際可行的措施，以減輕愛好和平人民對於軍備的沉重負擔。

富蘭克林·D. 羅斯福
溫斯頓·S. 邱吉爾

（載《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件》）

① 譯文出自《國際條約集 1934—1944》，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六一年。

①對於中國東三省的舊稱「滿洲」，中文的文獻一般均用「滿洲」表示，但二十世紀上半葉，日文對此的表述多用漢字「滿州」，本書作者為尊重歷史，沿用「滿州」一詞。本書的譯文也用「滿州」，只為尊重原著，不代表認同這一表述。



圖 1-4 波茨坦會議，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七日開始召開，美英蘇首腦參加，討論了戰後對德國的處理、對日戰爭的終結方式。七月二十六日發表了波茨坦公告。

州^①、台灣、澎湖列島歸還中國，朝鮮獨立，剝奪日本對南洋諸島的委任統治權。

緊接著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末，羅斯福、邱吉爾、斯大林舉行了德黑蘭會議，

會上主要討論了對戰後德國的處理。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的雅爾塔會議討論了對德的最終作戰與對德國投降後的處理。這次會議與日本緊密相關的是，秘密協定將保障蘇聯對南樺太、千島列島主權，以此為條件來促使蘇聯參與對日作戰。

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發表的波茨坦公告奉勸日軍無條件投降，並明示了戰後對日本處理的方針（圖 1-4）。這是由美、英、中三國首腦簽訂（後蘇聯也加入）的，規定了十三項內容，包括鏟除軍國主義的基礎、佔領領土、促進民主化、縮減領土、解散軍隊、維持除軍需產業以外

的和平產業、允許將來參與貿易關係等。

由此，同盟國作為戰勝方，特別是英、美，不僅保持了其戰前的既得權益（可以在公海上自由航行、可以在國際經濟中自由競爭等），還繼承了戰敗國的權益。且為了維持這種國內外的體系，並不斷地進行體系的再生產，他們還把自己「自由」、「民主主義」的概念無條件地對戰敗方進行滲透。也就是說戰後國際體系首先是作為一種有能力同化、均一化的體系形成的。之後再通過經濟實力與軍事實力來維持這種體系。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四日，聯合國作為戰勝方五大國中心的體制成立了，五大國在其中享有著巨大的權限——否決權。

戰後國 際體系 的形成

上述過程是與美國對日佔領的各種基本設計相互關聯而形成的。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納粹德國入侵波蘭、挑起歐洲大陸上的戰火時，美國雖然還沒有參戰，國務卿赫爾就已經開始下令討論德國、日本投降時應該如何處理。一九四一年成立了外交問題諮詢委員會第二次委員會，參戰之後，一九四二年春又在此委員會中成立了「遠東班」，開始具體討論從日本投降到佔領的過渡、佔領形態、佔領政策。

在當時美國輿論的背景之下，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的想法是非常嚴苛的無

後記

佔領改革時代的歷史定位和意義，經過高速增長期與戰後體制的動搖發生了巨大變化。越來越多的人認為，與佔領期相比，高速增長時期對自己的一生、對整個世界作出的改變更大。而佔領研究的基本觀點，也是立足於如下判斷：能夠實現高速增長是因為幸運，以及由卓越領導人主導的佔領改革時代的存在。而現在，更多的人開始覺得戰後期對自己來說既不是幸福，也不是甚麼壯麗的時代體驗，戰後體制正在動搖之中，那麼佔領期又具有甚麼樣的地位和意義呢？戰後體制的動搖意味著，用戰後的改革來說明戰後的成功已經行不通了。這要求我們用戰後以外的時期，比如戰後期以前與以後來解釋戰後期的種種表現。

一九八〇年代後期登上論壇的總力戰體制論，正是對這種要求的一個回應，而在本書中筆者最大的課題就是援引總力戰體制論的方法，對佔領與改革的時代進行分析。這個困難的課題同時又與書寫「通史」的困難重合在一起。在「結語」中筆者也提到，雖然此前對「地方上的佔領」、對「除白人、日本人、

男性、健全者以外的主體的佔領」進行了調查研究，但那與把研究成果運用到「通史」的書寫中，還相差甚遠。

諸多佔領期研究的大家、中堅、年輕學者都通過他們的論文給了筆者非常多的指導。特別是福永文夫先生，他主要通過GHQ的原始資料與採訪調查研究這一時期，還有專長於憲法制定過程的古關彰一先生，在治學和文獻、資料上都給了我很大幫助。福永先生閱讀了本書的初稿，並賜予了寶貴意見。本書第四章後半與第五章的事實經過與整體結構大都是依據福永先生的著作。正是由於有了這些優秀的先行研究，筆者才能夠自由發揮，開展自己的立論。此外，對於本書所使用的四個潮流的概念，其主體與政策的延伸性時間跨度之長，筆者自身也有些驚訝。

執筆期間，筆者還在自己執教的大學參與了創立綜合政策學科和地域綜合研究所的工作，非常忙碌。作為研究所的研究課題，還與主張「下流社會論」的三浦展先生一起，就「後『睡城』時代的都市系統」及其在戰後體制形成和崩潰中的作用進行了共同研究。

另外需要說明的是，本書內容基本上是新執筆的，只是第六章中有相當多的部分與《戰時戰後體制論》的第三、第五章有重合。還要衷心感謝負責本書編輯

工作的平田賢一先生，他總是不斷激勵拖延寫作日程的筆者完成本書。最後還要感謝夫人洋子，是她一如既往支持著我的寫作。

雨宮昭一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